

金沙江下游与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

刘志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 通过文化因素的分析、比较, 可知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既具有自身特色, 又深受重庆峡江地区的影响。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框架大致得以构建。金沙江下游地区史前时期的文化格局以江为界, 南北两岸传承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关键词: 新石器时代; 金沙江下游; 重庆峡江

中图分类号: 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5-0032-04

一

三峡库区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为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新材料, 并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初步建立了文化序列。与此同时, 同为一江的金沙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却仍处在初始阶段, 目前仅见赵殿增、^[1]周志清^[2]和徐学书等先生^[3]的相关文章, 且多是通过金沙江中游的西昌礼州遗址^[4]和元谋大墩子遗址^[5]进行比较而得出的研究成果。随着近年金沙江流域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 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良好契机。鉴于金沙江与峡江地缘相连, 环境相似, 我们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对比, 从而为研究二者的文化面貌和谱系关系打下基础。

二

重庆峡江地区和金沙江下游在地形和地势上颇为相近, 均为江水下切形成的峡谷, 两侧山势陡峭, 水流湍急。文化遗址多分布在河谷地带两侧地势较为平坦的台地上。

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前段为玉溪坪文化, 后段为中坝文化, 绝对年代在距今 5000~4000 年之间。

玉溪坪文化以丰都玉溪坪遗址为代表。据报道, 玉溪坪遗址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的器物组合主要是深腹罐、高领壶、卷沿罐和敛口钵等。以夹砂陶为主, 泥质陶较少。纹饰包括绳纹、菱格纹、刻划纹、指压纹和箍带纹等。第二期的器物组合主要是深腹罐、高领壶、小罐、钵、盘、碗等。以夹砂陶为主, 泥质陶数量有明显增加。纹饰流行菱格纹、折线纹和水波纹等。出现磨光灰胎黑皮陶、折腹器和细瓦棱纹等新的文化因素。第三期的器物组合主要是深腹罐、高领壶、大口罐、带沿罐、钵、碗、器盖和高圈足器等。泥质陶的数量继续上升, 但夹砂陶仍占主导。流行纹饰有拍印绳纹、戳印纹、小泥饼堆纹和瓦棱纹等。^[6]此外, 玉溪坪文化还包括万州苏和坪遗址早期遗存和忠县哨棚嘴遗址第二期遗存等, 其绝对年代在距今 5000~4600 年之间。

中坝文化以中坝遗址为代表。孙智彬先生根据中坝遗址 1998、1999 年的发掘资料, 将该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的器物组合包括缸、瓮、罐、盘、壶、钵、碗、器盖等。陶质以夹砂陶为主, 泥质陶较少。陶色以灰陶为主, 次为红陶、黑陶和褐陶。纹饰以菱格纹为主, 包括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和划纹等。第二期的器物组合包括缸、罐、豆、簋、盘和碗等。陶质以夹细砂为

主,泥质陶数量有所增加。陶色以灰陶为主,次为红陶和黑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包括附加堆纹、弦纹、划纹、篦点纹和戳印纹等。第三期的器物组合包括尖底缸、卷沿罐、圈足盘、盆、钵和器盖等。陶质以夹粗砂为主,泥质陶很少。陶色以红褐陶和红陶为主,灰褐陶和黑褐陶较少。纹饰以绳纹为主,包括弦纹和附加堆纹等。^[7]此外,中坝文化还包括忠县哨棚嘴遗址第三期遗存、巫山魏家梁子和锁龙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存,其绝对年代在距今 4600~4000 年之间。

玉溪坪文化和中坝文化代表了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的前后不同发展阶段,年代上从仰韶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晚期。可以说,包括玉溪坪文化和中坝文化在内的前后相接的六期文化基本上建立起了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的时空框架。

三

金沙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因在该区域进行的田野工作较少,发掘材料较为有限,时空框架尚未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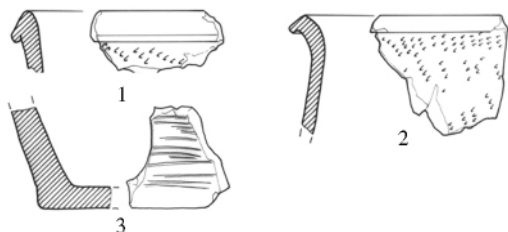
位于金沙江下游(云南境内)的昭通阐心场遗址和鲁甸马厂遗址,代表了滇东北黔西北地区新石器末期至青铜时代的一种地方文化类型,或称之为“阐心场类型”,^[8]或称之为“鸡公山文化”。^[9]这类遗存的器物组合包括单耳细颈瓶、单耳罐和带釜罐等,器物多带单耳是其文化特色。泥质陶较多,夹砂陶较少。纹饰以素面为主,可见弦纹和点纹,部分陶器表面施黑色陶衣并打磨光滑。属于这类遗存的还有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吴家大坪遗址和营盘山遗址,昭通黑泥地遗址和鲁甸野石遗址等等。其绝对年代在距今 3300~2700 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晚期、春秋早期。^[10]虽然在绝对年代上这类遗存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中晚期,但是从其文化性质和发展水平上来看,仍可以代表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特色。

从文化内涵来看,金沙江下游的鸡公山文化与重庆峡江地区的玉溪坪文化和中坝文化大相径庭,并且在产生和延续的时代上也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二者是属于分布于同一流域,但是独立起源并沿着各自道路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并未产

生过交集。

位于金沙江下游(四川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遗址主要有叫化岩遗址和石柱地遗址。其中叫化岩遗址是金沙江下游(四川境内)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1]该遗址位于宜宾市屏山县城以东约 20 公里的金沙江北岸,发掘者将地层分为 8 层,其中 6~8 层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堆积。发现的遗迹包括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房址、灰坑和灰沟。从遗址的性质上来看应为史前一个规模较小的村落或临时性聚居地。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将该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的器物组合主要包括敛口卷沿罐和侈口折沿罐,陶质以夹粗砂陶为主,陶胎较厚,夹细砂陶和泥质陶的数量均较少。陶色以黄褐和红褐为主,兼有黑褐、灰黄和灰黑。素面陶占的比重较大,纹饰主要以交错绳纹为主,还包括有绳纹、篦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等。第二期的器物组合除敛口罐和侈口罐外,开始出现花边口罐、盘口罐、高领罐、壶和钵等。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第一期有明显增加,几乎与夹砂陶数量相当。陶色以红褐和黄褐为主,兼有黑褐、灰褐、灰黑、灰黄和灰白,新出现黑皮陶。素面陶的数量较多,纹饰以交错绳纹为主,兼有绳纹、篦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凹弦纹和刻划纹等,新出现细瓦棱纹。第三期的器物组合包括敛口罐、侈口罐、花边口罐、盘口罐、壶、尊和豆等。陶质以夹粗砂陶最多,泥质陶其次,夹细砂陶最少。陶色以黄褐和红褐为主,灰褐和黑褐其次,灰陶数量有明显增加。纹饰以交错绳纹为主,其次为弦纹、附加堆纹、篦纹、戳印纹和刻划纹,有少量镂孔,素面陶的数量有所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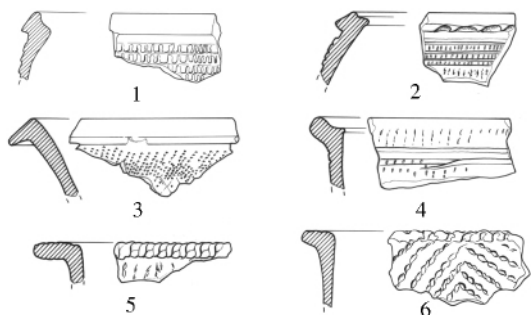
从出土的器物组合来看,叫化岩遗址第一期的文化面貌较为单纯,以侈口罐和敛口罐为代表(图一)。



图一 叫化岩遗址第一期陶器

1、2. 侈口罐 (T15⑧:2、T15⑧:1) 3. 器底 (T15⑧: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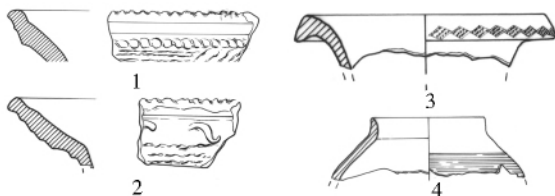
第二期出土的陶器则明显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以侈口折沿罐、敛口卷沿罐、折沿圆唇花边口罐为代表（图二）。



图二 叫化岩遗址第二期第一组陶器

- 1、2. 敛口罐（T87⑦:9、T81⑦:6） 3. 敞口罐（T15⑦:16）
4. 侈口罐（T81⑦:5） 5、6. 折沿圆唇花边口罐（T81⑦:7、T87⑦: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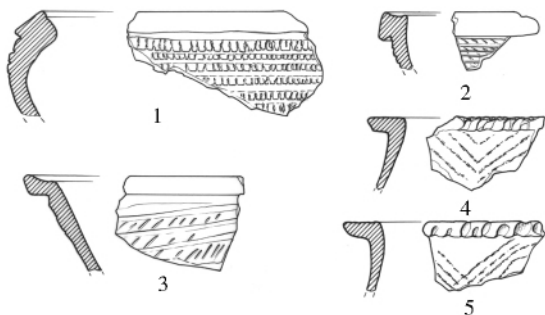
第二组则为本期新出现的文化因素，包括盘口罐、高领罐、壶和钵等。泥质黑皮陶的出现和细瓦棱纹的流行是本期的显著特征（图三）。



图三 叫化岩遗址第三期第二组陶器

- 1、2. 盘口罐（T87⑦:13、T87⑦:17） 3. 卷沿壶（T15⑦:4）
4. 直口高领罐（T82⑦: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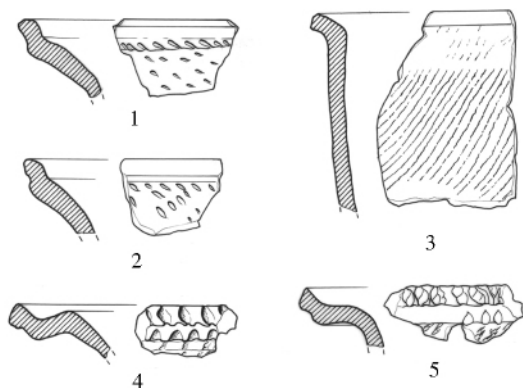
第三期出土的陶器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以侈口折沿罐、敛口卷沿罐、折沿圆唇花边口罐为代表（图四）。



图四 叫化岩遗址第三期第一组陶器

- 1、2. 敛口罐（T81⑥:21、T83⑥:8） 3. 敞口罐（T74⑥:6）
4、5. 折沿圆唇花边口罐（T74⑥:35、T74⑥: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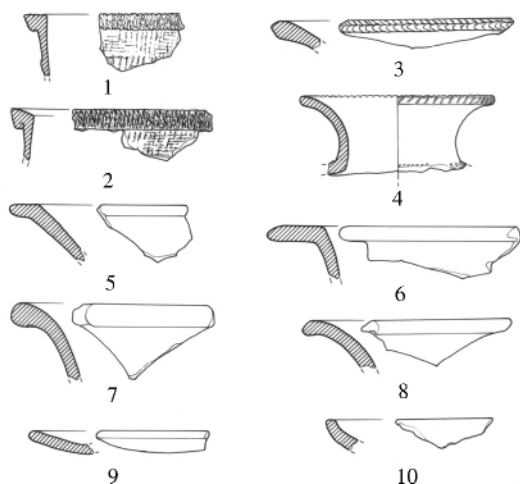
第二组以盘口罐、侈口深腹罐和壶为代表（图五）。



图五 叫化岩遗址第三期第二组陶器

- 1、2. A 型盘口罐（T72⑥:3、T74⑥:22） 3. 侈口深腹罐（T88⑥:7） 4、5. B 型盘口罐（T82⑥:51、T88⑥:22）

第三组为新出现的器物群，主要包括折沿方唇花边口罐、喇叭口高领罐、尊和浅盘豆等（图六）。



图六 叫化岩遗址第三期第三组陶器

- 1、2. 折沿方唇花边口罐（T87⑥:13、T87⑥:11）
3、4. 喇叭口高领罐（T87⑥:6、T88⑥:8）
5、6. 尊（T82⑥:18、T82⑥:14） 7、8. 壶（T86⑥:1、T88⑥:10） 9、10. 豆（T82⑥:22、T88⑥:40）

从其文化内涵来看，叫化岩遗址第一期和第二、三期的第一组器物较为独特，为其他地区所不见，应属于当地土著文化因素。第二期的第二组器物明显具有玉溪坪文化的特色。第三期的第二组器物也属于来自重庆峡江地区的文化因素，带有中坝文化的特征。第三期的第三组器物则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具有相似性。从其文化构成来看，第一期和第二、三期的第一组器物是该遗址的主体文化因素，代表了金沙江下游一个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因此可以命名为叫化岩类

型。

从其年代上来看,叫化岩遗址第三期出土的 A 型盘口罐与中坝文化二期出土的盘口罐(H644:12)相似,并且在出土器物中没有发现中坝三期常见的尖底器,因此叫化岩遗址的年代下限应不晚于中坝二期。叫化岩遗址第二期出土泥质黑皮陶和带细瓦棱纹的陶器与玉溪坪文化第二期出土的器物十分相似,年代也应该在此范围之内。第一期的材料由于出土较少,而且面貌较为独特,缺乏可对比的材料。但从其出土器物与第二期第一组具有延续关系来看,年代也不至于相差太远。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叫化岩遗址的年代上限相当于玉溪坪文化二期或稍早,下限应不晚于中坝文化二期,其绝对年代应该在距今 5000~4500 年之间。

四

在分期和年代学的基础上,再来对比金沙江下游和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就不难发现在距今 5000~4500 年之间,上述两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一直存在交流。目前在重庆以西、宜宾以东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以江津王爷庙遗址为代表。^[12]有学者分析江津王爷庙遗址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应该属于玉溪坪文化,^[13]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无疑是十分合理的。这就为金沙江下游和重庆峡江地区的文化交流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支点。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在玉溪坪文化时期,叫化岩遗存主要受到来自峡江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出现大量的泥质黑皮陶器,器物上流行装饰细瓦棱纹,并且开始有折腹风格的器物出现。到了中坝文化时期,除了来自峡江地区的文化因素外,成都平原的文化因素也开始在这里出现,大量折沿厚方唇细绳纹花边口罐和喇叭口高领罐就是宝墩文化南下的证据。

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因此大江大河形成的水路成为当时人们交流与往来的主要交通方式,金沙江与长江本就是沟通东西、人群往来的重要通道。从距今 5000 年开始,玉溪坪文化由重庆峡江地区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宜昌中堡岛遗址^[14]和宜宾叫化岩遗址均发现带有玉溪坪文化特征的器物,而

在哨棚嘴遗址第二期也曾发现有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15]说明在这一时期重庆峡江地区的玉溪坪文化与瞿塘峡以西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而在属于玉溪坪文化的遗址中并未发现有属于叫化岩类型的典型遗物,这说明该时期金沙江下游地区只是单纯的接受来自于玉溪坪文化的影响,并未对重庆峡江地区文化输出。距今 4600 年左右的中坝文化时期,情况也与此类似。只是在此时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表现较为强势,大量的宝墩文化因素开始在叫化岩遗址中出现,而来自于重庆峡江地区的文化因素则有所减少。岷江下游宜宾河段曾多次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遗物,^[16]推测宝墩文化应是顺岷江而下至宜宾然后溯金沙江而上至此的。中坝文化与宝墩文化有着一批较为类似的器物,如高领圆肩壶和盘口深腹罐等。有学者推测二者在嘉陵江一线曾发生过密切往来,^[17]现在看来金沙江下游地区至少也是二者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

从金沙江下游这一区域自身来看,其所涵盖的考古学文化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基于目前已有的发现,金沙江下游北岸的叫化岩类型和南岸的阐心场类型,二者不仅仅是在年代上存在差距,而且在文化传统上也完全不同。阐心场类型多带耳器、带流器,这明显属于来自西部地区的文化因素,与金沙江中游时代更早的大墩子等遗址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似乎更有渊源;而叫化岩类型出现的花边口器、盘口器则属于东部地区的文化传统,与峡江地区、成都平原出现的考古学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以江为界,两种文化传统并行不悖,这或即金沙江下游地区史前的最初格局。

注释:

[1] 赵殿增 《金沙江流域早期考古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02 年第 4 期。

[2] 周志清 《浅析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中华文化论坛》2002 年第 4 期。

[3] 徐学书 《由石棺葬遗存浅谈对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再认识》,《中华文化论坛》2002 年第 4 期。

[4]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 《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 年第 4 期。

[5]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 年第 1 期。

(下转第 93 页)

道三教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它代表了清末到民国初年四川的宗教、庄园、民居、园林等建筑特点,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吸收和展现了西洋建筑装饰艺术的建筑风格。加上抗日战争时期东北中山中学和东北中学曾迁址于此,使它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

静宁寺建筑群集中分布,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研究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独特,整个寺庙楼台亭阁密布、殿宇连绵、其建筑规模宏大,气势恢弘,布局精巧,殿、院、祠、堂、阁、塔、亭、台、楼、桥、池、井、木雕、石刻俱全。建筑群整体上以民间四合院为主,宗教意味让位于世俗生活。儒释道三部分各体现各自宗教建筑的特点,又相辅相成、互为掩映、和谐统一。其特色建筑如慈善堂、字库塔、观音阁、儒林院等,由于受近代西方建筑理念的影响,修建者在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引入西洋建筑风格,产生中西风格结合的特色。儒林院外结构、慈善堂窗、观音阁的雕刻都堪称精美(图版叁:2、3)。整个建筑内分布各类雕塑装饰图案,图案精美,注重环境园林装饰性,既考虑到实用又具建筑美感,风格既统一又各具特色。以儒林院为例,儒林院建筑面积约 1300 平方米,为两层砖木结构。外观采用欧式建筑风格,为长方体型城堡样式,整体简洁;内部为传统四合院形式,院内由一个十字型两层通道划成四个天井。其中两个天井中建有一个月型水池和一口圆型水井,象征日月。两层十字型通道与两层建筑回廊连接,使人在建筑内行动方便。

而十字型通道交会部依势建成一个八方型凉亭,并采用木雕花窗装饰,美观大方。

静宁寺集儒释道三大教于一身,其宗教、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影响远达广东、湖南、贵州、山东、东北等 10 多个省市及海外部分国家和地区。同时,静宁寺内的慈善堂还是当时四川慈善联合总会的所在地,其声誉之高、影响之大,冠绝川南。整个建筑内各类楹联、字画、浮雕等艺术结合紧密,文化气氛浓厚。静宁寺内出土的道教经书,内容有《辅正心经》等书籍,宣扬为善为孝戒恶勤劳等思想,反映了当时的民俗、宗教思想,也为研究当时的宗教活动、民俗风情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张学良将军创办的东北中学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于 1939 年迁址静宁寺,在此达 8 年之久,在静宁寺宣传爱国思想、先进的科学技术,为静宁寺赋予了丰富的爱国革命内涵。两校迁入后的 8 年,成为两校最出成果、最出人才的时期。8 年间共培养了 8000 多名学子,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民族精英,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祖国建设时期的优秀人才,如原国家经贸委主任李东,著名诗人杨星火,著名数学教授丁尔升,中科院院士赵鹏大,参加设计和制造我国第一批飞机、第一艘导弹潜水艇、第一台拖拉机的教授(高级工程师)方同德、廖湘思、何保献、苟池中,北京大学原校长陆平,导弹之父王明久等。两校校友遍及世界,影响深远。其教学宗旨和进步思想犹存,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场所。

(上接第 35 页)

[6] 邹厚曦、袁东山 《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 《重庆·2001 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 年。

[7] 孙智彬 《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初论》,《四川文物》2003 年第 3 期。

[8] 王大道 《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年。

[9] 张合荣、罗二虎 《试论鸡公山文化》,《考古》2006 年第 8 期。

[10] 同 [9]。

[11] 刘志岩 《四川屏山向家坝库区叫化岩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 《2009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 年。

[12] 重庆博物馆 《重庆市长江河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2 年第 12 期。

[13] 于孟州、蒋刚 《重庆峡江地区中坝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6 期。

[14]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 《朝天嘴与中堡岛》,科学出版社,2001 年。

[15] 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等 《忠县哨棚嘴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1999 卷》,科学出版社,2006 年。

[16]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队 《四川宜宾南部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4 期;魏宁等:《岷江下游宜宾河段再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四川文物》1989 年第 3 期。

[17] 蒋晓春等 《川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初探》,《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